

实证调研

Shi Zheng Diao Yan

父母参与、学校融入

与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

康——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证据

□ 柳建坤 何晓斌 贺光烨 张云亮

摘要：本文实证分析了当代中国具有典型意义的两组儿童（农村留守儿童vs.农民工随迁子女；农民工随迁子女vs.市民子女）的心理健

关键词：父母参与；学校融入；心理健康；留守儿童；随迁子女

DOI:10.19633/j.cnki.11-2579/d.2020.0036

一、引言

1980年代以来，随着城镇化的高速推进，中国劳动力逐渐形成了从农村流向城市的空间配置模式，并且在迁移模式上日益呈现“人户分离”的特征。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全国“人户分离”人口为2.98亿人，占总人口的21.78%。对于已经组建家庭的成年农民工而言，由于在决定子女是否流动的决策上存在差别，造成了农民工子女内部出

现了留守与随迁的分化。但由于农民工对流动成本的支付能力较弱，以及对户籍制度带来的各种限制的考虑，因而将子女留在农村成为大多数家长的选择。作为中国下一代人口的主要构成，生活在城市的农村随迁子女以及规模更庞大的农村留守子女的健康成长对中国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在应对策略上，中央政府和流入地政府针对随迁子女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保护受教育权利的重大举措，有效缓解了随迁子女“上学难”“上学贵”等实际问题。相比之下，农村留守子女面临着更为严重的身心

发展问题,包括更高的患病率^[1]、消极心理明显^[2]、学业成绩差和在学率低^[3],以及出现多种不良行为甚至是违法犯罪^[4]。需要指出的是,在留守儿童所面临的诸多风险中,心理劣势被认为是造成学业困境和行为失范的重要原因。虽然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并且证实了留守经历会对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但仍有两方面需要改进的空间:第一,多数研究是基于对特定地区的小学生进行抽样调查的。这使我们既无法确定这些研究发现对留守子女这一全国性现象的解释效力,也难以验证留守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否存在于其他年龄层。第二,以往的关于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比较研究在选择比较组时一定的问题,这导致某些重要的影响机制尚未得以揭示出来。多数文献主要是比较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来检验父母外出务工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但缺少农村留守儿童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比较分析。而且,即便能够举家迁移到城镇地区,由于随迁儿童在物质资源和教育机会的获取、本地同辈关系网络的发达程度等方面与本地儿童存在很大的差距,因而在主观心理层面也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这意味着针对随迁儿童与本地儿童比较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对于农民工家庭而言,无论其子女是处于留守还是随迁状态,都可能受到负面心理带来的损害,但这需要将理论框架与双方实际的生活情境有机结合来分析各自的影响机制,并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进行验证。

鉴于此,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初中教育阶段,并且重点比较农村留守子女与农民工随迁子女、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城市本地儿童的心理健康差距。我们将上述两组对象整合到人际关系理论的分析框架中,从父母参与和学校融入的视角分析两组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差距的形成逻辑,并运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tudy, CEPS) 2013—2014年度调查数据进行实证考察。

二、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1. 人际关系与心理健康

从关系论视角探究个体健康变化根源的研究者强调,应对社会关系所发挥的作用予以重视^[5]。现有文献也证实了人际关系对减轻健康威胁甚至降低整体死亡率具有积极作用^[6]。大体来看,人际关系对个体健康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种机制来实现的:一是关

系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可以向所属成员传递信息或资源,或者施加规范性约束^[7];二是关系网络向个体提供物质性或情感性的社会支持^[8]。其中,社会支持机制凸显了个体与他人的关系状态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这也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针对美国的研究表明,高质量的人际互动可以为个体倾诉内心活动和表达情感提供渠道,从而大幅降低居民的抑郁水平^[9]。基于中国情境的研究也取得了类似的发现。赵延东对西部省份居民的研究发现,具有高紧密度、低异质性以及强关系等特点的社会网络可以明显提升个体的精神健康水平^[10]。

对青少年而言,其所属的关系网络通常是由内部的家庭网络和外部的学校网络这两部分组成。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第一场所,是其在发展过程中获取物质资源和心理情感的最主要来源。因此,家庭结构的完整性以及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关系,直接关系到青少年获取社会支持的规模和质量,其心理健康水平也因此受到影响。当亲子沟通不畅、父母关系紧张以及家庭结构瓦解时,子女的精神压力会迅速增大,负面心理会显露出来^[11]。此外,学校是青少年开展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并通过与同学的互动建立外部性关系网络,因而构成了导致其心理健康变化的另一来源。一旦这种关系网络因友谊破裂而瓦解,或者其建立在成员的不良行为基础上,都会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迅速下降^[12]。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和学校这两种关系网络的影响可能因青少年群体内部的异质性而有所差别,而这在本研究所讨论的中国留守子女、随迁子女以及城市本地子女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留守—随迁”组中,两类子女在户籍身份、家庭经济条件以及早期的生活方式上具有很高的同质性,但是否跟随父母外出则直接导致双方与父母的互动关系能否得到延续,这成为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对于“随迁—本地”组而言,虽然随迁子女拥有较为完整的家庭结构,但生活空间的转换使其脱离了原有的同辈关系网络,而在城市学校与本地子女建立交往关系的困难则很可能成为诱发其负面心理的主要原因。由于两组青少年在家庭关系和学校关系存在显著的不同,意味着每一组青少年间的心理健康差距具有独特的形成逻辑。

2. 父母参与与“留守—随迁”两类儿童的心理健康差距

核心家庭是现代家庭结构的主要形式,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主要围绕亲子关系展开。在家庭所体现的

社会化意义上,子女能否确立符合社会规范及价值观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在其生活和学习中所扮演的角色。处于青春期的子女对外界信息的理解力有了很大提高,认知模式会经历剧烈的变化过程,很容易产生抑郁、自我认知模糊、自尊心受挫、自我效能感下降等心理问题^[13]。在这一阶段,亲子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在一般情况下,家庭结构处于完整状态,此时出现的亲子冲突是引起青少年负面心理出现的主要原因。而一旦出现父母长期外出的特殊情况,亲子关系处于事实性断裂的状态,这构成了对青少年正常心理的另一种破坏性因素^[14]。因此,对于生活在不完整家庭结构的青少年而言,父母参与是造成其心理健康变化的重要原因。

父母参与(parental involvement)属于家庭教养行为的范畴,通常是指父母通过多种方式进入到子女的日常生活并给予资源投入,以便在最大程度上促进子女的身心发展^[15]。大量文献证实了父母参与对子女健康发展的密切关系。国外研究者发现,父母为子女提供更多的照顾和关爱,增加互动和交流的频率,并且更加公开地表达情感,可以使子女感受到更少的痛苦感、更高的幸福感和更多的社会支持^{[16][17]}。而在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在成年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流动的过程中开始瓦解,对子女的双亲监护逐渐被单亲或隔代监护取代,由此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留守儿童问题。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父母长期外出导致留守儿童出现很多的心理问题,包括对学校的心理适应变差^[18]、自信心不足^[19]、孤独感较强^[20]以及社交焦虑等^[21]。

总体而言,学术界已对留守经历对儿童成长的负面影响达成了共识,但在关于心理健康问题上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现有文献主要是通过比较研究来显示留守经历与非留守经历的效应差异,但针对留守儿童所选取的对照组主要是农村的非留守儿童,对随迁儿童的关注度不够。即使有研究证实了留守儿童在社会适应能力上弱于随迁儿童,但单一指标很难完全反映心理健康的整体情况。事实上,随迁子女与留守子女在前期生活经历、家庭经济情况上是高度相似的,但在家庭结构完整性上的差异巨大,这能够凸显父母参与对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解释效果,因而双方更具有比较研究的价值。第二,现有研究对父母参与这一解释机制的操作化并不精确,仅以父母是否外出务工作为测量指标,有必要根据父母参与的概念内涵来

设置相应的指标。第三,以往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对欠发达省份的农村地区的调查项目,具有样本规模小且对全国的代表性不足等弱点,这使其结论的推论价值受到很大的限制。在与现有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即留守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随迁子女,本文强调父母参与是双方心理健康差距形成的核心机制。因此,可以提出如下的研究假设:

假设1a: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低于农民工随迁子女

假设1b:父母参与可以解释这一组儿童之间的心理健康差距

3. 学校融入与“随迁一本地”两类儿童的心理健康差距

举家外出是当前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另一种模式。由于随迁子女的家庭结构处于基本完整的状态,其与父母的日常性互动能够维持在较高的频率和质量,也即父母参与的效用可以得到一定保证,因而在诸多成长指标上都明显优于留守儿童。但在流入地的城市地区,户籍制度形成了新的二元分割体制,使成年农民工和随迁子女均面临严重的社会融入问题。但与成年农民工需要首先考虑缩小工资差距的问题不同,对随迁子女影响更大的则是获得受教育权利以及学校融入问题。随迁子女在城市地区的活动主要围绕学校展开,但户籍制度以及教育成本设置了很高的入学“门槛”,造成该群体的失学率高于全国同年龄段的平均水平^[22]。即使他们能够在城市就读,进入公立学校的概率显著低于本地儿童^[23]。

随着近年来一系列旨在增进随迁子女异地入学权利的政策实施,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然而,随迁子女融入学校的同辈关系网络面临着更大的难题,在学校中很难与本地学生建立起持久的互动关系。以武汉市为例,钟涨宝和陶琴发现,农民工子女对本地学生的社会距离高于本地学生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社会距离,主要原因是随迁子女对城市的认同感较弱以及自我意识偏低^[24]。汪长明指出,由于流动儿童在适应城市性文化的过程中存在诸多困难,会强化在主观上“他者”的身份认知,因而对农民工子女的好感和认同更强。而本地学生也会因经济地位的优越感和“陌生人”心理而疏离随迁子女。更为严重的是,学校融入的困境显著降低了随迁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25]。针对上海市农民工子女的研究表明,有相当高比例的随迁子女患有焦虑、抑郁等心理症状,而这些问题又与同学关系的不和谐存

在密切联系^[26]。刘庆对武汉市4~9年級的随迁子女进行调查后发现,他们在学校和社会的融入感知,孤独、抑郁以及被歧视等消极心理非常明显^[27]。

虽然基于若干城市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学校融入与心理健康存在紧密关联的证据,但仍需要通过分析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来检验上述发现的推论意义。另外,由于随迁子女和本地儿童的显著差别体现在各自与学校的同辈群体的交往关系上,因而选择二者作为比较对象能够凸显心理健康变化过程中的学校融入机制,这也正是被以往研究所忽略的方面。据此,可以提出另外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2a: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市民子女

假设2b:学校融入可以解释这一组儿童之间的心理健康差距

三、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负责并组织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在2013—2014年收集的样本。此次调查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采用多阶段的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进行抽样,该数据不仅包含学生个体的信息,还涉及家庭、学校、社区等多层次信息,能够较好地保证实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在剔除相关变量的缺失值后,最终获得的初中生样本规模是11548。其中,农村留守儿童、农民工随迁子女以及市民子女的数量分别为2348、2056和7144。

2. 变量说明

(1) 因变量

因变量是初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其在CEPS问卷中由下列5个题项来测量,即询问受访者“在过去的7天内,你是否有以下感觉”:“沮丧”“抑郁”“不快乐”“生活没有意思”“悲伤”。原始的答案赋值方式是:从不=1,很少=2,有时=3,经常=4,总是=5。在进行正向赋值的基础上,我们将这些定序变量调整为取值范围是[0,1]的定距变量。在此基础上我们构建了两个综合性指标。首先,参考姚远和张顺的方法^[29],将这5道题加总求平均值,再乘以100,最终获得一个取值为[0,100]的连续变量。其次,针对5个单项指标,我们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principal-component factors)并采用最大方差方法(orthogonal

varimax)进行旋转。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的结果显示,针对5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所得到的KMO值为0.861,大于0.6的界限值,表示该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另外,Bartlett球形检验的 χ^2 值很大,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以拒绝指标与公因子之间不相关的原假设。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我们从5个指标中提取了1个公因子。另外,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为0.857,说明该公因子所包含的指标对其有很好的信度。

表1: 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载荷	3.204
沮丧	0.813
抑郁	0.820
不快乐	0.826
生活没有意思	0.736
悲伤	0.804
特征值	3.204
贡献率	0.641
累计贡献率	0.641
KMO检验	0.861
Bartlett球形检验	$\chi^2=39523.306, p=0.000$
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0.857

(2) 自变量

儿童类型(三分类)。CEPS调查从户口性质、户口登记地以及是否与父母同住这三个维度将初中生划分为五类,分别是:非农本地父母都在家、非农本地父母不全在家、农业流动父母都在家、农业流动父母不全在家、农业本地父母不全在家。据此可以构建“儿童类型(三分类)”这一自变量,其操作化方式是:将第五类学生视为农村留守儿童,将第三、四类学生视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将第一、二类学生视为市民子女,分别编码为0、1、2。

此外,由于本研究的重点是比较农村留守儿童与农民工随迁子女、市民子女与农民工随迁子女这两组儿童各自的心理健康差距及其作用机制,因而需要构建可以区分出每一组儿童的自变量。一是农村儿童的流动状态。如果儿童留守在农村,编码为0;反之,儿童与父母随迁到城镇则编码为1。二是城镇儿童的户籍身份。如果儿童拥有农业户口,编码为0,表示

该群体是农民工随迁子女；相反如果拥有非农户口，则编码为1，意味着这一类儿童是市民子女。

（3）中介变量

父母参与。无论是农村留守儿童还是随迁子女的父母在教养方式上主要是以日常性照顾为主，而认知启发和情感交流上有所不足。考虑到这一情况，基于Grolnick and Slowiaczek（1994）提出的“行为—认知—情感”三层次参与模型^[30]，本文构建了三个测量指标。“行为参与”涉及4个题项，分别是父母和孩子一同吃晚饭、读书、看电视和做运动的频率。答案赋值方式是：0=从未做过，1=每年一次，2=每半年一次，3=每个月一次，4=每周一次，5=每周一次以上。四题分值加总即为该维度得分。

“认知参与”涉及三类问题。一是“你父母是否经常与你讨论以下问题（具体讨论问题包括学校发生的事情；你与同学的关系；你与老师的关系；你的心事或烦恼）？”。受访者需要针对父亲和母亲两种角色分别作答，选项有“从不”“偶尔”“经常”三项，分别赋值为0、1、2。其余两类题项分别为父母和孩子一起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场所的频率，以及一起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等的频率（0=从未做过，1=每年一次，2=每半年一次，3=每个月一次，4=每周一次，5=每周一次以上）。将测量认知参与变量的12道题目的得分加总即为该维度得分。

“情感参与”主要考察青少年自身对父母的积极感受，涉及7个题项。前两道问题是询问青少年对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的评价，答案的赋值方式是：0=不亲近，1=一般，2=很亲近。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青少年的父母对其未来的信心，选项是：0=根本没有信心，1=不太有信心，2=比较有信心，3=很有信心。最后三个题项是考察青少年在三种场景（想要聊天/遇到麻烦/需要帮忙）中会首先寻找哪种人作为求助对象，提供的选项有：同学和朋友、父母、亲戚、老师、没人可找。如果受访者的回答中出现一次“父母”即计1分。将上述7个题目的得分加总即为情感参与维度的得分。

学校融入程度。CEPS询问了受访者在本地的五个好朋友的数量以及他们是否为同校的情况。据此，我们以受访学生的同校好朋友占其全部好友比例来测量。该变量的数值越大，表示青少年与学校的同辈群体的交往越密切。

（4）控制变量

本研究使用的控制变量涉及学生个体、学生父母

以及学校三个层次。学生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0=女性，1=男性）、年龄、独生子女（0=是，1=否）、所在年级（0=七年级，1=九年级）、对未来的信心、与母亲的关系（0=不亲近，1=一般，2=很亲近）。父母特征变量包括：父辈受教育水平、自评家庭经济状况（取值范围是[0, 4]）。学校特征变量包括：学校类型（0=公立学校，1=民办公办学校，2=普通民办学校，3=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校排名（0=最差，1=中下，2=中间，3=中上，4=最好）。

本文分别针对“留守—随迁”“随迁—本地”两组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了均值差异检验。留守儿童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随迁儿童，并且二者的差距在四项单项指标上也是显著的。另一方面，随迁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城镇本地儿童。虽然这一差异并不在统计上显著，但很可能是由于未考虑其他可能会影响心理健康水平的因素所造成的。接下来，我们将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计学生的流动状态和户籍身份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并且结合倾向值匹配方法获得更可靠的因果关系。

四、实证分析结果

1. 基准回归结果

在模型1和模型2中，因变量分别是根据均值法和因子分析法计算的心理健康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儿童流动状态变量的系数分别是-1.624和-0.081，且均在1%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表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随迁儿童。此外，我们比较了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市民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其结果由模型3和模型4所估计。结果显示，户籍身份变量的系数分别为-0.930和-0.047，且都在10%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随迁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城镇本地儿童。在前面的描述性统计分析部分，我们发现了农村留守儿童、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市民子女这三类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呈现由低到高的梯次分布。这里的回归分析结果从群体比较的角度展示了儿童的心理健康差距，这体现在农村留守儿童与农民工随迁子女之间以及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市民子女之间。假设1a和假设2a得到验证。

此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值得关注。在学生个体层面，性别、是否是独生子女都不会显著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状态。但年龄越小，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而且，对未来的信心不足以及和母亲的关系

疏远,也会使儿童的心理健康变差。父母特征变量对子女健康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即使父辈拥有高学历,并不一定会对子女的心理健康产生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家长自评的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子女的心理状况越佳。这一发现与姚远和张顺(2016)的研究是一致的,表明学生对自身心理状况的评价与通过主观自评方式确定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联系更为紧密。在学校层面,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学校的排名并无显著的关系,但会受到学校性质的影响,也即就读于公立学校的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高于就读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

2. 中介机制检验

(1) “父母参与”和“学校融入”的中介效应

这一部分主要是对“留守—随迁”和“随迁—本地”两个比较组是否分别存在“父母参与”和“学校融入”两个影响机制进行验证。关于中介机制检验,我们首先借鉴了Baron and Kenny所设计的经典方法,基本原理是:以解释变量X对被解释变量Y具有统计上的显著作用作为前提,机制变量Z一方面显著受到变量X的影响,同时对变量Y具有明显作用^[31]。据此,针对“流动状态—父母参与—心理健康水平”这一因果链的检验步骤如下:第一步,将心理健康水平对流动状态进行回归。第二步,将三个维度的父母参与变量(行为、情感和认知)对流动状态进行回归。若系数在统计上显著,表明父母参与机制是受到学生的流动状态影响的。第三步,将心理健康水平对流动状态和测量父母参与的变量进行回归。将这一步所得到的流动状态变量的系数与该变量在第一步中的系数进行比较。如果系数不显著或者显著但系数绝对值下降,则可以证明农村儿童的流动状态是通过父母参与机制导致心理健康水平出现差距的。此外,上述思路也被用于“户籍身份—学校参与—心理健康水平”因果链的检验中。

表3汇报了针对“留守—随迁”两类儿童来检验父母参与机制的回归结果。M3、M5和M7的结果显示,行为参与、情感参与和认知参与这三个中介变量能够显著提高心理健康。同时,在三个模型中,流动状态变量的系数值或显著性相比于M1中的情况出现明显的下降。根据检验中介效应存在的标准,可以初步判定农村留守儿童与农民工随迁子女在父母参与程度上的差别会导致二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出现差距。另外,针对“随迁—本地”两类儿童检验学校融入机制的结果被展现在表4中。M3的结果显示,同校好朋友

表2:农村儿童的流动状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

	心理健康 (均值)	心理健康 (因子)	心理健康 (均值)	心理健康 (因子)
	M1	M2	M3	M4
流动状态(1=留守)	-1.624*** (0.626)	-0.081*** (0.0305)		
户籍身份(1=是)			-0.930* (0.564)	-0.047* (0.0275)
年龄	-0.551* (0.314)	-0.027* (0.015)	-0.679** (0.266)	-0.033** (0.013)
对未来的信心	6.730*** (0.463)	0.324*** (0.023)	7.675*** (0.366)	0.372*** (0.018)
与母亲关系 (0=不亲近)				
一般	7.654*** (1.880)	0.371*** (0.092)	8.794*** (1.927)	0.427*** (0.094)
很亲近	13.050*** (1.826)	0.632*** (0.090)	15.53*** (1.893)	0.752*** (0.092)
父辈教育程度	0.183 (0.141)	0.009 (0.007)	-0.236*** (0.084)	-0.012*** (0.004)
自评家庭经济地位	1.592*** (0.497)	0.077*** (0.024)	1.817*** (0.437)	0.089*** (0.021)
学校类型(0=公立)				
民办公助	-3.690 (4.146)	-0.178 (0.200)	-1.845 (3.407)	-0.089 (0.165)
民办	-0.586 (1.045)	-0.031 (0.051)	-2.074* (1.152)	-0.105* (0.056)
民办打工子弟	-3.790** (1.816)	-0.184** (0.088)	-2.917* (1.720)	-0.141* (0.084)
常数项	51.570*** (5.477)	-1.029*** (0.267)	53.430*** (4.604)	-0.939*** (0.224)
样本量	4235	4235	8936	8936
R ²	0.116	0.115	0.125	0.124

注:(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2)*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3)因篇幅所限,表中只显示检验显著的变量。

比例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城镇儿童的朋友网越依赖于本校，越可能产生积极的心理状态。同时，M3中的户籍身份变量系数相比于M1的情况不仅出现了数

值上的下降，而且不在统计上显著。这意味着学校融入是造成农民工随迁子女和市民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存在高度差别的重要原因。

表3：关于父母参与的中介机制检验（留守vs.随迁）

因变量 自变量	心理健康	行为参与	心理健康	情感参与	心理健康	认知参与	心理健康
	M1	M2	M3	M4	M5	M6	M7
流动状态 (1=留守)	-1.624***	-3.068***	-0.744	-0.111***	-1.529**	-1.354***	-1.490**
行为参与			0.294***				
情感参与					2.413***		
认知参与							0.33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51.57***	7.829***	49.70***	1.760***	47.90***	1.437	47.50***
样本量	4235	4254	4110	4326	4172	3831	3708
R ²	0.116	0.213	0.121	0.552	0.140	0.204	0.134

注：(1)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2) 控制变量包括学生性别、学生年龄、是否为独生子女、所在年级、对未来的信心、与母亲的关系、父辈教育程度、自评家庭经济地位、学校类型、学校排名。

表4：关于学校融入的中介机制检验（随迁vs.本地）

因变量 自变量	心理健康	同校好朋友比例	心理健康
	M1	M2	M3
城镇户口 (1=是)	-0.930*	0.0509***	-0.358
同校好朋友比例			0.65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常数项	53.43***	1.125***	48.92***
样本量	8936	6710	6527
R ²	0.125	0.024	0.138

注：(1)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2) 纳入的控制变量与表3相同。

(2) 流动状态的影响效应

接着，我们采用KHB方法对中介变量的影响进行了分解。模型设定步骤如下：简化模型（Reduced Model）纳入了自变量和其他的控制变量，检验的是流动状态或户籍身份对因变量的总效应（total

effect）。完全模型（Full Model）进一步加入中介变量，展示的是核心自变量的直接效应（direct effect）。这样，总效应与直接效应的差值就是核心自变量的间接效应（indirect），也即中介变量所发挥的作用。

对于“留守—随迁”两类儿童而言，当同时纳入了表示父母参与机制的三个中介变量后，核心自变量（流动状态）的直接效应大幅下降，从而产生了较大的间接效应，其对总效应的贡献率达到了42.09%。这意味着父母参与机制确实在农村儿童的流动状态造成心理健康出现差距的因果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Panel B则展示了对中介效应的分解结果。可以看到，行为参与在总中介效应的贡献接近一半（47.76%），而情感参与和认知参与的贡献率较为接近，分别为25.58%和26.67%。这表明父母参与机制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行为参与来体现的。另外，在“随迁—本地”儿童组中，当加入了同校好朋友比例变量后，核心自变量（户籍身份）的直接效应的下降幅度也非常明显，由此产生的中介效应约占总效应的-31.04%，这再次证实了关于学校融入会导致随迁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城镇本地儿童的结论。这样，假设1b和假设2b被充分证实。

表5：基于 KHB方法的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农村留守儿童 vs. 农民工随迁子女				农民工随迁子女 vs. 市民子女			
Panel A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的贡献率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的贡献率
-1.861***	-1.078	-0.783***	42.09 %	-0.851	-1.116	0.264***	-31.04%
Panel B							
	行为参与	情感参与	认知参与		同校好朋友比例		
各自效应	-0.374	-0.200	-0.209	各自效应	0.264		
各自贡献率	47.76%	25.58%	26.67%	各自贡献率	-31.04%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3. 流动状态的内生性检验

关于农村儿童流动状态的文献强调要重视以样本选择偏差为代表的内生性问题。对于农村儿童而言，无论是留在农村还是跟随父母迁移到城市，决定这两种状态的过程并不是随机的。因为父母会根据家庭的经济条件以及子女的身体状况来决定是否携带子女流动到城市，这使得留守儿童与随迁儿童在诸多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相比之下，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的随迁儿童与城镇本地儿童的差别就表现得更加凸出。因此，如果直接考察流动状态或户籍身份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就会由于样本的选择问题导致基于OLS方法估计的结果是有偏的。

为此，我们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处理上述内生性问题。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控制变量计算的倾向得分值（Propensity Score）来找到与处理组（Treatment Group, TG）相似的控制组（Control Group, CG），使得两组样本在各方面特征不具有显著差异。在本研究中，对于“留守—随迁”两类儿童而言，处理组是留守儿童，控制组是随迁儿童。对于“随迁—本地”两类儿童而言，处理组是随迁儿童，控制组是本地儿童。首先，使用Logit模型对匹配变量进行筛选，参与筛选的匹配变量为本文回归模型中出现的所有控制变量。其次，基于Logit模型的拟合值计算出相应的倾向得分值对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匹配，匹配方法包括最近邻元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kernel matching）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local linear regression matching）。最后，我们采用“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来估计自变量的效应。

表6是使用四种匹配方法得到的ATT结果，其中标准误估计结果是通过自助法（bootstrap）进行200次检验所得。结果显示，ATT都是显著为负的。这表

明儿童的流动状态和户籍身份都会导致不同类型的儿童之间出现心理健康的差距。具体而言，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水平比农民工随迁子女低1.520~2.738，而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心理水平比市民子女低2.302~3.345。因此，在最大程度上控制了样本选择偏误带来的影响后，流动状态和户籍身份对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仍然是非常稳健的。

表6：流动状态和户籍身份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ATT）

匹配方法	留守（处理组）vs. 随迁（控制组）	随迁（处理组）vs. 本地（控制组）
最近邻元匹配	-2.738 (0.975) **	-2.607 (1.088) **
半径匹配	-1.803 (0.750) ***	-2.302 (1.422)
核匹配	-1.520 (0.683) ***	-2.557 (1.005) **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1.559 (0.880) *	-3.345 (1.802) *

注：括号内为基于bootstrap200次方法获得的标准误差；在最近邻元匹配中邻元数为1；半径匹配中半径设定为0.0008；核匹配、局部线性回归匹配的宽带分别为默认宽带0.06、0.8；*、**、***分别代表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五、结论与讨论

根据流动状态和户籍身份两个维度，当代中国的儿童可大体上可以被划分为三类群体：农村留守儿童、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市民子女。本文主要讨论了“农村留守儿童vs.农民工随迁子女”和“农民工随迁子女vs.市民子女”两个比较组的心理健康差距及其影响机制。基于强调社会支持逻辑的人际关系理论，我们提出了由父母参与和学校融入两个机制构建的解释框架。根据所利用的CEPS（2013—2014）调

查数据的样本特点,我们将分析对象聚焦于既有文献较少涉及的初中生群体,对其进行实证分析后获得了三个研究发现:第一,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农民工随迁子女,并且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市民子女。也就是说,这三类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呈现出一种由低到高的梯次分布形态。第二,父母的行为参与、情感参与和认知参与均可以有效解释留守儿童和随迁儿童之间形成的心理健康差异,但行为参与的作用更强。第三,学校融入程度低是造成农村随迁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城镇本地儿童的重要原因。

上述结果表明父母参与和学校融入分别是“留守—随迁”和“随迁—本地”两组儿童出现心理健康差距的机制之一。当前,留守子女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2016年,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了大规模的摸底排查,明确指出家庭监护缺失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通过积极落实临时监护和防止辍学的责任等应对方法。但正如本研究发现的,父母参与的不足甚至缺失,是诱发留守子女负面心理的重要原因,父母在家庭监护中的重要性远非隔代亲属以及非亲属的监督所能替代的。非父母监护固然能够解决某些留守儿童无人监护的问题并切实保护人身安全,但并不能产生针对心理健康的防御和保护机制,也就无法杜绝留守子女失范行为的心理根源,难以保证其健康成长的持续性。因此,在现阶段城市化趋势不可扭转的情况下,跟随父母一同流动到城市无疑是解决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有效途径。然而,实现这一过程又需要诸多的辅助条件,包

括在制度和政策上降低农村家庭的流动成本,改善在流入地的生活水平,以及为子女提供融入条件等。

另一方面,即使农村儿童从留守改变为随迁状态,其与父母联系的增强将有助于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但随迁子女在流入地仍会因在融入学校过程中受到阻碍而产生负面的自我心理评价。这种在学校场域中所体现的文化和心理融入困境,除了与外地学生和本地学生因长期地域隔离而造成的生活经历、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有关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户籍制度导致的身份歧视以及家庭经济地位的巨大差距。因此,如果要破除农民工随迁子女与本地甚至是本校的市民子女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的“藩篱”,关键在于解除户籍制度施加在前者身上的身份束缚,提高其父母的经济融入程度,稳步推进农民工家庭向城市社会的融入过程。总之,户籍制度的放松对于农民工父母监护留守子女,以及农民工随迁子女构建学校内的关系网络,并最终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都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在政策层面,户籍制度需要针对农村人口的流动模式以及融入状况进行灵活性调整,这对于阻断制度、经济和健康等多种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效应是至关重要的,由此才能为推进中国城市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

柳建坤: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何晓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贺光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张云亮: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应用社会学系讲师

责任编辑/陈晨

参考文献:

- [1] 丁继红,徐宁吟.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健康与教育的影响[J].人口研究,2018(1).
- [2] 白勤,等.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培养模式实验研究——基于现场干预后心理健康状况前后变化的数量分析[J].管理世界,2012(2).
- [3] 胡枫,李善同.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基于5城市农民工调查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9(2).
- [4] 董士昱,李梅.农村留守儿童监护问题与犯罪实证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 [5] 李建新.老年人口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J].人口研究,2007(3).
- [6] Berkman L F, Syme S L. Social Networks, Host Resistance, and Mortality: A Nine-year Follow-up Study of Alameda County Residents [J].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979, 109 (2): 186-204.
- [7] Lin Na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J].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8] Van der Poel, M. G. M. Delineating Personal Support Network [J]. Social Forces. 1993, 15 (1): 49-70.
- [9] Lin Nan, Ye Xiaolan, Ensel W M.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ed Mood: A Structur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999, 40 (4): 344-359.
- [10] 赵延东. 社会网络与城乡居民的身心健康 [J]. 社会, 2008 (5).
- [11] 叶苑, 等. 青少年家庭功能的发展特点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6 (6).
- [12] 杨磊, 戴优升. 家庭社会资本、学校环境会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吗? ——基于 CEPS 数据的实证分析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 (1).

- [13] Fergusson D M, Horwood L J, Ridder E M, Beautrais A L. Subthreshold Depression in Adolescence and Mental Health Outcomes in Adulthood [J].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2005, 62 (1): 66-72.
- [14] Gao Y, Li L P, Kim J H, Congdon N, Lau J, Griffiths S. The Impact of Parental Migration on Health Status and Health Behaviours among Left Behind Adolescent School Children in China [J]. BMC Public Health. 2010, 10 (1): 56.
- [15] [英] 斯图尔特·霍尔. 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 [M]. 徐亮, 陆兴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16] Canetti L, Bachar E, Galili-Weisstub E, De-Nour A K, Shalev A Y. Parental Bonding and Mental Health in Adolescence [J]. Adolescence. 1997, 32 (126): 381-395.
- [17] Taanila A, Laitinen E, Moilanen I, Järvelin M R. Effects of Family Interaction on the Child's Behavior in Single-Parent or Reconstructed Families [J]. Family Process. 2002, 41 (4): 693-708.
- [18] Wen M, Lin D. Child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Children Left Behind by Their Migrant Parents and Children of Nonmigrant Families [J]. Child Development. 2012, 83 (1): 120-136.
- [19] 周宗奎, 等.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1).
- [20] 范兴华, 等. 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与一般儿童社会适应比较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5).
- [21] 赵苗苗, 等.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2 (1).
- [22] 段成荣, 梁宏. 我国流动儿童状况 [J]. 人口研究, 2004 (1).
- [23] 周皓, 巫锡炜. 流动儿童的教育绩效及其影响因素: 多层线性模型分析 [J]. 人口研究, 2008 (4).
- [24] 钟涨宝, 陶琴.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本地学生的社会距离研究——基于双向度社会距离测量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0 (8).
- [25] 汪长明. 从“他者”到“群我”: 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融入问题研究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3 (3).
- [26] Wong F K D, Chang Y L, He X S. Correlates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in Shanghai, China [J].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2009, 44 (10): 815-824.
- [27] 刘庆. 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社会融入感的结构与影响因素分析 [J].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4).
- [28] Karlson K B, Holm A, Breen R. Comparing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Same-Sample Nested Models Using Logit and Probit: A New Method [J].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2012, 42 (1): 286-313.
- [29] 姚远, 张顺. 家庭地位、人际网络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J]. 青年研究, 2016 (5).
- [30] Grolnick W S, Slowiaczek M L. Parent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s Schooling: A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ualization and Motivational Model [J]. Child Development. 1994, 65 (1): 237-252.
- [31] 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 (6), 1173.

(上接第 84 页)

- [6] Wacquant L. Pugs at work: Bodily capital and bodily labour among professional boxers [J]. Body and society, 1995, 1 (1): 65-93.
- [7] [22] [23] [24] [法] 布尔迪厄. 区分: 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M]. 刘晖,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330, 331, 28.
- [8] 钟洁. 健身房: 一种规训机制的分析——以上海健身房 G 为例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 [9] 高昕. 权力规训视域下的健身实践——以健身房为例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 (12): 30-36.
- [10] [31] 唐军, 谢子龙.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规训与区分——对健身实践的社会学考察 [J]. 社会学研究, 2019 (1): 29-56.
- [11] 王健. 自我、权力与规训: 可穿戴设备的社会学分析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 (12): 5-12.
- [12] 涂炯, 王瑞琳. 在失控与控制之间: 新技术嵌入下青年人的日常健康实践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 (12): 21-29.
- [13] 李荣誉, 刘子曦. 健身与男性气质建构 [J]. 妇女研究论丛, 2018 (3): 108-118.
- [14] 宋庆宇, 刘能. 中产阶级的身体管理: 以跑步运动为例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 (10): 85-93.
- [15] [29] [法] 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 [M]. 姜志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199-200, 134.
- [16] 张文义. 社会与生物的连接点: 医学人类学国际研究动态 [J]. 医学与哲学, 2017 (10): 39-42.
- [17] Huizinga J. 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 [M]. London: Temple Smith, 1970: 203.
- [18] Elias N, Dunning E. Quest for Excitement: 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M]. Oxford: Blackwell, 1986: 114.
- [19] [26] [英] 克里斯·希林. 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 [M]. 李康,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34.
- [20] [21] 王宁. 消费的欲望 [M].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5: 26.
- [25] [英] 维克多·特纳. 仪式过程: 结构与反结构 [M]. 黄剑波, 柳博赞,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95.
- [27] Breton D Le. Playing symbolically with death in extreme sports [J]. Body and Society, 2000, 6 (1): 1-11.
- [28] Higdon H. Is running a religious experience? [M]. S. J. Hoffman (ed.), sport and religion. Champaign: Human Kinetics, 1992: 80.
- [30] 董建辉, 张雪婷. 规训之术: 日据时期的台湾高山族教育 [J].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 84-95.